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一辑)

主编：罗选民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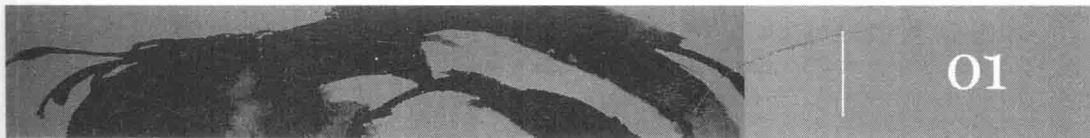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大学出版社

#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一辑)

主编：罗选民



01

---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第1辑 / 罗选民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2-42218-1

I. ①亚… II. ①罗…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5 ) 第279426号

责任编辑：刘琦榕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溧源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 × 260mm 印 张：12.75 字 数：235千字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49.00元

---

产品编号：063270-01

## 主办单位 / SPONSORS

---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 主编 / EDITOR IN CHIEF

---

罗选民

## 编委 / EDITORIAL BOARD

---

Anthony Pym, Rovira i Virgili University, Spain  
Bao Chuanyun,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SA  
Edwin Gentzl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USA  
Frank Austermuehl,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Henrik Gottlieb,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Isabelle Rebut,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France  
Hey Trevor,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Jeremy Munday, University of Leeds, UK  
Lawrence Venuti, Temple University, USA  
Luise von Flotow,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eiru Liu,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USA  
Michael G. Watson,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Phrae Chittiphalangsri,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Robert Neath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Vicente Rafa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Xie Shaobo,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Zheng Bingham, Durham University, UK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刘树森, 北京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单德兴, 台湾中研院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编者的话

当今，“亚太”地区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纷纷将注意力投向了这些领域。然而，该地区的人文学科，尤其是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到重视，甚至遭到了忽视。

历史已经见证了爱德华·赛义德（Said 1979: 6）所批判性地提出的“东方主义”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基于“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其中“东方”被描述成是被动的、顺从的，且缺乏自主性和创造主体性。如今，随着人们共同努力，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对一种新型的关系进行重新语境化和重构，这种现象逐渐得以缓解。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至少两种文化、两种心智之间的转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亚太地区要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翻译是根本。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旨在为译界的学者们提供一个展示亚太地区翻译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平台，增强亚太地区翻译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学者们的“文化自觉”意识，推动该地区翻译研究的发展和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的输出，并最终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本集刊将展示亚太地区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的重要成果，涵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文学、语言学、历史、艺术、媒体与传播学、文化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力图从跨学科的角度呈现亚太地区的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真实概貌。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承办，并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官方国内学术出版物。《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将继承中国翻译研究中的优良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融入翻译行为、翻译教学等方面的最新学术成果。本辑邀请了国际翻译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编委会，通过严格的匿名评审制来提升质量。

第一辑设置四个栏目：“理论探讨”“案例分析”“翻译散论”和“学术动态”。

“理论探讨”一栏从跨学科翻译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与历史、翻译与哲学、翻译与地缘文化、翻译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史料和语料角度新颖、丰富翔实，为跨学科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罗选民的《论钱锺书的文学翻译观》

对“化境”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化境”论不应简单地套用中国传统译论或西方翻译理论来解释,而是应从整体观念出发,注重其与中国传统译论的承接以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化境”论从“信”“不隔”到“化”的译之理想,从“失本成译”到“讹”的译之本质,从“通、达”到“媒、诱”的译之功能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联健的《新教传教士英译晚清官府文件析论》展示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英译出版的清朝官府文件,并将其中的单篇文献分为“中英关系”“清朝政务管理”“禁教与弛禁”以及“中国黑暗面”四个大类;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传教士翻译中国官文的主要动机。同时,以米怜译《圣谕广训》为个案展现新教传教士英译中国官府文件的具体风貌。蔡新乐的《翻译哲学的阴阳之道:从“明”看儒家思想之于翻译的意义》通过荷尔德林的《伊斯特》和海德格尔对此诗的解说探讨“阴阳之道”,并以亚里士多德的“爱”和严复的“三难”在后现代语境下西奥·赫曼斯的英文翻译为例,论证“阴阳之道”在界定翻译本质上及其对文化关键词处理的重要意义。周领顺和陈慧的《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地缘关系——以杨必译〈名利场〉中译者群及其吴语运用为例》以苏籍译者群为研究对象,对其方言在译文中的运用展开地缘关系分析,并具体通过对杨必译《名利场》个案的研究,得出译者在译文中引用吴语是求原文之真、务读者需求之实之举。本栏最后一篇文章译自于美国学者 Bella Brodzki 所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 翻译、存活和文化记忆》(Can These Bones Live? Translation, Survival and Cultural Memory)一书的序言。该文以翻译的“文化转向”为背景,探讨翻译对文化存续、文化记忆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的政治与译者的隐身问题,并分析各种的小说和传记,发现翻译与文学、文化、历史的关系,进而重新界定翻译的多重身份及其影响。

“案例分析”一栏的讨论基于丰富多样的文本,既有国学经典《论语》,又有中国现代小说《阿Q正传》,还有中外戏剧文本《原野》和《哈姆雷特》,同时也有紧贴时事的财经新闻。汪宝荣的《〈阿Q正传〉两种早期英译本描述性研究》分析了该小说的梁译本和敬/米译本。这两个译本开启了鲁迅小说英译历程,具有重要的翻译史意义。梁译本总体上“墨守直译法”,由于过于追求译文充分性,其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很低;敬/米译本任意删削、篡改原文,故导致其译文的充分性很低。这两个译本是鲁迅小说翻译史上的极端案例,但是三位译者为鲁迅小说在域外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旭的《表演性文本之翻译——以黎翠珍英译〈原野〉第二幕为例》分析该戏剧译本语言的音乐性,进而达到可表演、可颂读以及读者/观众接受之目的。戏剧译本的特殊性在于译本的诞生不仅涉及译者的翻译过程,也

有导演和演员的诠释过程，需要充分考虑这种生成方式才能达到良好的表演效果。

- 萧文乾的《基于剧文形式的〈哈姆雷特〉14个汉译本批评——以奥菲莉雅歌谣与场末押韵双行诗为例》以两种代表性的剧文形式对14个重要译本提出批评。通过分析奥菲莉雅歌谣，作者发现译界仍无法用汉语重现英语的抑扬格与扬抑格，也因此无法用译文区分出原文的不同剧文形式。而场末押韵双行诗的分析则显示，原剧出现的14次场末押韵双行诗，不同时期译本的押韵数量在大体上反映了时代特征，却也出现了几个值得探讨的特例。张萍和王焱丹的《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韦利与苏慧廉对“仁”的理解和翻译》比较了两位译者《论语》英译本中“仁”字翻译的不同，分析了译者教育和宗教背景等个人因素在其翻译过程中的显现和对翻译文本的控制。阿瑟·韦利身为汉学家，对“仁”的翻译更多倾向于其世俗的含义；而苏慧廉的传教士身份则让他对“仁”的理解带有更多的宗教情怀。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选择是译者主体性对于译本形成影响的鲜明例证。潘韩婷的《情态动词翻译中的机构权威重构——基于语料库的香港财经新闻稿翻译研究》通过语料库辅助的方法研究情态动词在香港交易所的公开谴责类新闻中的使用及翻译，探讨了情态动词翻译如何帮助重建文本背后的机构权威。情态动词的翻译增强了文本的权威语气，这种变化可能与文本生产者及不同文本消费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翻译散论”一栏是学者多年的教学与阅读经验的总结分析，以期为本刊的读者提供翻译研究与教学的灵感与启示。郭立秋的《谈国外公示语之“译”外事故》是在阅读《不知所译——英语在国外的不幸遭遇》一书的基础上，摘取非英语国家公示语英译的典型错误，并将其按照衣、食、住、行等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类别，描述了英语公示语在世界各地被扭曲误用的种种乱象，深入剖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及对公示语翻译的启示意义。冯睿和徐弘的《翻译及语言学习：这是个大问题》探讨笔译及口译带来的两个负面影响：一个是重复学习造成语言学习效率低下，另一个是作为（中）介语的语言错误难以消除。该文通过分析这两个负面影响的起因及源头，研究了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交流与语言学习中笔译及口译的真实作用。

“学术动态”一栏旨在介绍亚太地区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翻译学术动态，从而拓展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辑总结并评述了2012年在广州以及2013年在青岛举行的两届“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对将来有规律地举办宗教经典翻译系列研讨会提出了设想。宗教经典翻译及研究有助于增强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根基，值得更多译家和学人为之努力。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发名家之声，同时注重提携学术后起之秀；所有文章，

严格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匿名评审,并将被中国知网(CNKI)收入;所设栏目大致稳定,但亦会根据每辑的来稿情况进行相应的微调。在第一辑即将付梓之时,主编向为第一辑组稿、编校和出版过程中付出良多的蒋林珊同学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致以最真挚的谢意,并诚邀各位学者投稿,同时也欢迎广大读者的批评与建议。

罗选民

2015年7月

#### 参考文献

Said, Edward W. 1979.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Ori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目 录

---

## 编者的话 v

---

## 理论探讨

罗选民

论钱锺书的文学翻译观 1

邓联健

新教传教士英译晚清官府文件析论 17

蔡新乐

翻译哲学的阴阳之道：

从“明”看儒家思想之于翻译的意义 29

周领顺 陈 慧

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地缘关系

——以杨必译《名利场》中吴语运用为例 46

[ 美国 ] Bella BRODZKI

《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翻译、存活和文化记忆》序言 57

---

## 案例分析

汪宝荣

《阿Q正传》两种早期英译本描述性研究 71

张 旭

表演性文本之翻译

——以黎翠珍英译《原野》第二幕为例 87

萧文乾

基于剧文形式的《哈姆雷特》14个汉译本批评

——以奥菲莉亚歌谣与场末押韵双行诗为例 111

张萍 王焱丹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韦利与苏慧廉对“仁”的理解和翻译 126

PAN Hanting

Authority Reestablished via Modal Verb Transl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Hong Kong Financial News Release Translation 139

---

## 翻译散论

郭立秋

谈国外公示语之“译”外事故 160

FENG Rui, XU Hong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That Is the Problem 170

---

## 学术动态

WAN Zhaoyuan

Scrip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Emerging Field of Scholarship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Two Recent Conferences 180

# 论钱锺书的文学翻译观 \*

## On Qian Zhongshu's Concept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罗选民

LUO Xuanmin

### 摘要:

钱锺书基于翻译实践,总结出“化境”这一文学翻译观。“化境”论不应简单地套用中国传统译论或西方翻译理论来解释,而是应从整体观念出发;注重其与中国传统译论的承接以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文章通过分析得出,“化境”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诱”“媒”“讹”“化”道出了译之功能,译之本质和译之理想。需要注意的是,把钱锺书有关翻译的论述运用到一切的翻译实践中是不妥的。

### 关键词:

钱锺书;文学翻译;“化境”论

### Abstract:

Based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Qian Zhongshu summarizes *huajing*, or sublimation, as his concep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can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or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instead, sublimation should be seen from the concept of wholeness by connecting it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rough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concept of sublimation is part and parcel of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in which “enticing”, “matchmaking”, “miswording” and “perfecting” manifest the function, the nature and the goal of translation. It should also be noticed that these concepts cannot be applied to all translation practice.

###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literary translation; *huajing*, or sublimation

\*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典籍英译的传播与评价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AYY001)之阶段性成果。

## 1. 引言

钱锺书<sup>1</sup>的“化境”论在我国译论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译界对钱锺书所著译论的探讨也从未停止，每年都有不少相关文章刊出。目前译界对于钱锺书的翻译观也存在着不同理解，特别是针对“化境”一说，存在各种解读，众说纷纭：有褒扬其美学价值，有批评其神秘虚无，有探寻其内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者，还有人将其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而对其进行现代性的阐释与转化。钱先生这个看似简单的“化”字，实则意蕴深远。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化境”，就不能将“化境”与《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具体语境相割裂，更不能将“化境”与钱锺书先生其他有关翻译的论述相隔离。本文拟从整体观的角度重新解读钱锺书先生从“信”到“不隔”再到“化境”的有扬有弃、与中国文论一脉相传的文学翻译观。

## 2. 钱锺书的翻译实践

2006年，我曾拜访杨绛先生，提到想设立一个“钱锺书翻译奖”。然而杨先生的回答却是：钱先生不做翻译。钱锺书先生到底做不做翻译成为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确很难从图书馆找到一本钱锺书署名的译著。但是，如果钱锺书不做翻译，他有关翻译的论述就难以让人信服。钱锺书先生到底做不做翻译？聂友军曾在《中国比较文学》上撰文“钱锺书翻译实践论”，但译例分析局限于钱锺书的学术论著《管锥编》，主要对其中一些散论的翻译抑或成语的翻译做了分析（参见聂友军 2008：33-46）。如果拿这个来证明钱锺书做过翻译实践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为此，笔者进行了调研，搜索了有关资料，发现钱先生是做过不少翻译实践的。

首先，众所周知，钱锺书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1950年8月钱锺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参见吴学昭 2008：251-25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灌注了钱先生的大量心血。据统计，钱锺书负责的翻译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钱锺书负责审校的文章有：《湖南农民问题考察报告》《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形势与任务》《红色边区的经济建设》等（王冰 2002：7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个特定的时代，翻译伟大领袖的选集就好像翻译《圣经》一样——领袖话语的翻译必须有一个权威的版本，但翻译时对原文意义的最终阐释，译文的定稿却往往并不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事情。翻译《毛泽东选集》这种政治性较强的著作在当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形下，一般都是集体翻译、集体

定稿。笔者曾经作为专家被邀参加了北京市政府有关“北京精神”（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的翻译定稿的讨论：“创新”该翻译成“creativity”还是“innovation”？“厚德”该翻译成“virtue”还是“moral”？虽然一共只有八个字，翻译起来却并非易事，近二十名专家一块讨论了一下午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难怪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参见严复 1984：136），此时感受尤深。翻译是经国之伟业一说并非夸张，它容不得半点的闪失，特别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形象的翻译，更得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才能把它做好。

后来成立的《毛泽东诗词》定稿小组也一样，都是由多人组成，翻译历时很长，钱锺书也是该定稿小组的成员之一。据叶君健的回忆，1960年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袁水拍为组长，成员就有乔冠华、叶君健、钱锺书，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叶君健和钱锺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叶君健 1991：7）。该译本最终于 1976 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来也成了外文出版社出版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可见钱锺书先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为了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了很多的翻译实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因为集体作业的缘故，他的业绩、他的名字不为人晓。

当然，钱锺书还是有一些发表于各期刊与报纸上的译作。其中比较完整的译文包括海因立许·海涅的《精印本〈堂·吉珂德〉引言》<sup>2</sup>，左拉于 1870 年 5 月 13 日刊登在《号召报》的一篇小短文《关于巴尔扎克》<sup>3</sup>等。1962 年 8 月 15 日的《文汇报》也刊登了钱锺书先生摘译的《弗·德·桑克梯斯文论三则》<sup>4</sup>。1979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其上编中的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部分由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和刘若端选译；下编中西欧及美国现代理论家和作家部分由钱锺书和杨绛选译。

此外，如果我们再梳理那些散见于钱锺书学术著作中的英、法、德、意等诸多外文引语的翻译，那一定是蔚为奇观的。比如，钱氏在《管锥编》中引用了一千多个作家超过一千七百条的名言警句，涉及英、法、德、意大利、拉丁和西班牙语在内的六种语言，基本都是用文言文翻译，地道的文言文几乎让读者分辨不出哪些地方是根据外文原著译来的。最后，除了自己翻译，钱锺书还帮人校对译稿，比如杨绛先生翻译的《吉尔·布拉斯》，杨必翻译的《剥削世家》都是由他帮忙校稿的。

钱锺书到底做不做翻译？我想还有其本人的说辞可作为依据：根据罗新璋的回忆，他在拜访钱锺书先生时说自己在外文局搞了十七年翻译，结果走得还不愉快；钱先生回答说，他也搞了十七年翻译（指“文革”前十七年）（转引自金圣华 2002：107）。然而，仔细深思杨绛先生所说的钱锺书不做翻译，我想杨先生是用高

标准来衡量的。她认为做翻译的学人,应该是译作等身,把自己大量的时间都投在文学翻译之上。我想这些的确是钱锺书所不具备的。他是“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做翻译,除了服从组织分配翻译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他基本是按组织的需要而做翻译,再就是因理论需要而做译介,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需要引用,因此,他的翻译总的来说是编译和摘译比较多。钱锺书有关翻译的论述被学界作为经典来阅读,这也绝不是偶然。钱先生的译文和他的译论一样零散,却值得我们好好整理和研究。正如罗新璋先生所说的那样,钱氏的译论与译文,以少胜多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举一反三(参见罗新璋 2013: 80)。

### 3. 有关钱锺书文学翻译观之分歧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主题为钱锺书翻译的文章有 148 篇,其译论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学界对钱锺书先生的译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上,而对该文的讨论大都停留在“化境”说之上。然而,译界对“化境”的理解一直都是见仁见智,各种解读,众说纷纭。首先,“化境”到底是翻译时应该遵守的标准还是翻译中不可企及的理想?有学者将“化境”看成是翻译必须遵循的标准,比如谭建香、唐述宗(2010)认为将“化境”定为翻译的最高理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化境”说只能是继“信、达、雅”之后的又一新的翻译标准。有学者认为“化境”并不能作为翻译的标准,比如陈福康(2000: 419)认为“化”虽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和原则。蔡新乐(2001)警告“不能盲目地接受钱锺书的‘化境’思想”,“化境”论只能是“愿望的自我欺骗”,是“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否定”。黄汉平(2003: 28)更是指出很多人中了钱先生“障眼法”的圈套,其实“化境”不过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想钱先生早在 1985 年就给予了答案——那年,钱先生在修订《林纾的翻译》一文时,就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中的“标准”两字换成了“理想”,而且文中也一再强调了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学界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化境”与传统译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化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延续,有学者却认定“化境”实际上是对传统“忠信”论的反叛。罗新璋先生在其《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就将我国传统的翻译思想归结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认为“化”既是对“信达雅”的一个突破,更是对“译事三难”馀绪的一种发展,因而认定“化境”是传统译论的一部分(罗新璋 2013: 49);冯世则(2001)也通过解读钱锺书《译事三难》一文,认定钱锺书对严说虽持异议但仍同意“信”为翻译的唯一原则;朱志瑜(2001)

也撰文回顾了由傅雷和钱锺书分别提出的“神似”和“化境”之说在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将傅、钱两人之说合称为“神话”说。然而，近年来很多学者对此似乎持不同的看法。郑海凌（2001）认为钱锺书的“化境”说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从而修正了传统译论中“求信”的美学原则；张佩瑶（2009：28）也认为钱先生的说法蕴藏着无穷的话语能量，甚至可以用来推翻基于忠信的翻译观，但较好的做法是把他的思想中无穷的能量释放出来，视他的文章为一种对忠信以外翻译观的肯定，从而拓展翻译的概念。崔永禄（2006：48）认为钱先生虽提出了“化境”翻译理论，但却发现它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包括林纾的翻译在内的现实翻译中充满了和原文的背离，这就足以使忠实原文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译论出现断裂。

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将钱锺书的化境与西方各种翻译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对其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与转化。有学者将钱氏翻译观与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如奈达相提并论，认为“化境”说与奈达的“动态对等”虽处于不同时期，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朱宏清 2001）；也有不少学者将钱锺书的译学理论与西方哲学思想如德里达、海德格尔等学说相结合（黄汉平 2003；蔡新乐 2005），认为钱锺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黄汉平甚至还认为钱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阐发的翻译思想与当代“多元系统论”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还有学者将钱先生的“化境”等同于施莱尔马赫的“归化”（崔永禄 2006；葛中俊 2012）。

“化境”到底在中国传统译论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对传统的延续还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叛？可以肯定的是钱锺书在写《译事三难》时至少对“信”是持支持态度的，那么其之前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却用“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来为林纾的漏译误译开脱，甚至赞扬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称林译“讹”中最具特色的成分正是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那么是钱锺书先生的观点前后矛盾，还是他对“信”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他的“化境”论是反对“信”的，那么为什么他会在其后的《译事三难》中又肯定了“信”的原则。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只能返回文本的语境中，从钱锺书的有关翻译论述着手，从整体观的角度来审视钱锺书先生的文学翻译观，从钱先生自己的论述中去寻找答案。因此，对于《林纾的翻译》一文的考察，不但要注意该文章写作的背景与动机，还应考虑该文与钱先生其他译论的关系，既要考虑钱先生的世界性的视野，又要考虑其中国传统思想的渊源，不能简单地否认传统的因素，更不宜将他的翻译理论与外国理论捆绑在一起。

如钱锺书和德里达都坚持翻译无法替代原作，但它独立存在，它与原作的关

系是互补关系,而非依附关系。本雅明、德曼等以“后起的生命”来比喻译作,而钱锺书借佛教语以“投胎转世”来形容译作,两者何其相似。但解构主义强调文字的“延异”,因为延异将无限的持续,故翻译的忠实性不复存在。在这一点上,钱锺书显然与解构主义分道扬镳。虽然钱锺书不承认绝对的忠实,但认为“信”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译作依原文“义旨”与“风格”来得以传递被看作是“信”的必要条件。

#### 4. 文学翻译观之整体解读

钱锺书有关翻译讨论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译论专文、谈译片段、涉译序跋和论译书札。其中有关翻译的文章有:1934年发表在《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论不隔》;1934年发表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家》(*The Chinese Critic*)第七期的“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up>5</sup>;1948年在《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发表的英文文章“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sup>6</sup>;1948年发表的《谈艺录》上不止一次谈到翻译问题;1964年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的《论林纾的翻译》<sup>7</sup>;1979年《管锥编》出版,书中有关翻译的文章有《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此外,钱锺书对翻译的灼见还出现在其诗和诗序之中。钱锺书虽然没有以鸿篇巨制来探讨翻译,但他对于翻译的重大问题都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论述。学贯中西的他表现出一种深锐的洞察力,睿智而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外来思想。因此,钱的翻译观虽有西方学说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既有传统的继承和扬弃。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本身就是从中国的典籍《说文解字》开始谈起的——翻译之“讹”就可追溯到佛经翻译时道安的“五失本”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失本成译”,认为“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他所提出的翻译的“媒、诱”功能,也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所说的“通、达”说相通;甚至“化境”说也是从“信”与“不隔”一脉相承发展而来。

##### 4.1 从“信”、“不隔”到“化”:译之理想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开篇,钱锺书就从清代文字学者许慎的一段训诂出发,汲取中国古代哲学之“化”的精髓,借鉴古典美学和传统文论中的意境和境界概念,精辟入理、高屋建瓴地道出,“化”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该文是钱锺书有关翻译论述的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论文,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境界是我国古典美学中的概念,王国维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曾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王国维 2011: 44)在文学艺术中,境界非客观可见的物或环境,而是彻觉彻悟并且凝练于心的某种品质,这

种品质必须通过直感与反复揣摩方能达到。“化”的最高境界表现在豁然开朗、洞察入微、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互相融化的状态之中。所以，“化境”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标准，而是钱氏心目中文学艺术与翻译的最高理想。翻译“化境”论的形成，与钱先生早年提出的“不隔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与钱先生对“信”的态度也是一致的——“不隔”与“化境”的第一要件就是“信”。真正的“信”，在钱锺书眼中却并非一种亘古不变的标准，而是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境界说是钱锺书文学翻译思想的主要特点，它将“信”、“不隔”与“化”串在了一起。

1934年，钱锺书在《学文》月刊上发表了《论不隔》，他借用了王国维的“不隔”说作为“好的翻译”和“好的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钱锺书说，“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严复《〈天演论〉绪例》所谓‘信达雅’的‘达’，翻译学里的‘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变成了美学上所谓‘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作者把所感受的经验，所认识的价值，用语言文字，或其他媒介物来传给读者”（钱锺书 2002：111）。因此，“不隔”说涉及翻译以及文学创作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化的翻译；一是翻译化的艺术。在艺术化的翻译里，“不隔指的是与原文的风格不隔”，“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糊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清楚它的糊涂”（钱锺书 2002：114），因此，“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钱锺书 2002：113）。这种强调译作与原作之间绝对透明，绝对不隔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以“信”为本的翻译观念基本是一致的。钱先生在其后提出的“化境”说里，同样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锺书 1985：2）。由此看来，入化的翻译，也同样强调译作对原作的忠实性和透明性。“信”成为“不隔”和“化”的第一要素，要达到“不隔”或者“化”的境界，首先必须得忠实于原文。

然而，从“信”“不隔”到“化境”，在钱先生看来并非是翻译所要遵循的标准，而是要追求的理想境界。钱锺书指出，严复并不想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相反，在翻译《天演论》时，为了让译文被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接受，他并没有做到对原作的绝对忠实。正如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 1984：136）。要达到与原作百分之百的“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而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强调，“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